

爱国知识分子——陈潜夫

□ 陶诗秀

天安门断指反帝

陈潜夫(1894—1950),出生于嘉定府(今乐山市)平兴乡陈坝。原名绍陶,又名甫霖,后于外出求学时,改用“潜夫”的名字。少年时期他在陈坝读私塾,1905年到嘉定府城进入“草堂寺高等小学堂”,与郭沫若同学。

陈潜夫幼年读书,常有独立见解。在家乡私塾读书时,国文教师有一次出的作文题为:《马、牛、羊优劣说》。不少同学都说马、牛优于羊。马能拉车,牛力大,能耕田;羊无用,只有养来吃肉。陈潜夫却说:羊优于马、牛,羊毛能做笔,用笔写文章,安邦定国平天下,羊的功劳大多了。对这篇作文,教师评了120分,说:“见识高远,不同一般,颇见新意,将来成就,未可限量。”老师的鼓励、专门指点和培养,对陈潜夫后来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有很大影响。

1912年,陈潜夫至成都,住成都共和大学,后同郭沫若一道去日本留学。陈潜夫读早稻田大学(经济学系)与农业大学。在求学过程中,他于1915年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国民党。

从日本回国后,陈潜夫应成都高等商科学校聘请,在该校教授日文;1921年,又到南京东吴大学任统计教材编辑及教授;后由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,教政治经济学;后又任北京女师大的教授。当蔡元培、张伯苓、黄炎培、马寅初、刘海粟等组建“中华教育改进社”不久,陈潜夫也参加了。1924年7月4日至8日,这个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周年年会时,陈潜夫与张伯苓、黄炎培、刘海粟(美术组主席)、陶行知(董事会主任干事)、方毅(国语教学组代书记)、邓萃英、郑贞文、余家菊、汪懋祖、孙恩元、左舜生、陈启天等一同出席会议,还被选为教育行政组书记。在会上,陈潜夫等提出了两个议案:一、请求力谋回收教育权案;二、无中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施行国民教育案,均获通过。

这期间,陈潜夫在李大钊影响下,还深入调查过工人运动,常同人力车夫和其他工人来往,有时还同工人同住。有几次,遇上反动政府的侦探跟踪,陈潜夫不知,车夫认识这些人,用车拉他穿胡同转弯飞跑,帮他甩掉“尾巴”。

1925年,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酿成“五卅惨案”,血信传到北京,激起了爱国的抗争怒潮。6月10日,各界市民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。满街的与会群众,臂围黑纱,胸佩白徽,悲愤激越,怒涛汹涌。会场共搭有五个演说台。每个台前,上挂白布横幅,大书“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”,左右张贴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的“泣血书”、京师总商会的“抵制英日,经济绝交,惨杀同胞,誓死力争”的长幅标语。参加大会的爱国团体有救国团、总商会、工会、农会、中华教育改进社、人力车夫工会、印刷工会、京汉铁路工会等157个团体和大、中、小学等计20多万人。

午后1时,群众推选北京市民代表李石曾、女界代表刘清扬为中台主席。李石曾主席宣布开会后,报告开会宗旨;刘清扬说明筹备经过;上海工界代表孙孚沅声泪俱下地报告英日巡捕惨杀我同胞的经过。群众一再高呼口号:“为工界同胞报仇!报仇!”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陈潜夫在中台讲话。他慷慨激昂,要求国人坚持反帝,不要“五分钟热情”,不要“一盘散沙”。说到激愤难忍处,潜夫抽出利刃把左手第四指前两节砍断,在白布上书“誓死救国”四字。不久,又血书“愿同胞猛省,勿存‘五分钟热心’”。陈潜夫断指泣告”等字。当时陈潜夫左手血流如注,面色惨白,仍大呼“救国”不止。终因流血过多,演说未完他便突然晕倒。台下群众哭泣失声悲愤高呼:“若不坚持到底,对不起上海惨死同胞,也对不起今天的断指壮士!”

会后,10多万人冒雨游行示威,坚持到执政府请愿。沿途,许多人都以陈潜夫断指反帝精神互相勉励。

陈潜夫晕倒后,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殿等扶下演说台,他还一直坚持要同群众一起去执政府请愿。因其流血太多,不宜长途走动,众人一再劝慰,才将他强送进协和医院,由女师大学生鲍士彦等日夜看护、陪伴。北京各界中外人士纷纷到医院慰问。

11日午后2时,北京市学联五十四校代表在师大开会,决议派二中、三中、求实三校代表赴医院慰问陈潜夫、丁文安、李良韶等诸君。陈潜夫的断指,由学联保存,并轮流送各校传观。从此,陈潜夫成了北京市和全国闻名的爱国主义者,他的壮举受到全国舆论赞誉,北京《晨报》、《世界日报》、上海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都连续报道、评论,特别是6月11日的《世界日报》还专列标题:《陈潜夫断指雪仇》及《陈潜夫之血书》,并全文刊载了潜夫事先写好的演说稿。文曰:

数十年来吾国备受外人侮辱。侨外同胞,既不与非洲“黑奴”同等待遇(黑种人尚可任意通行,旅外同胞,则有时不准登陆),而潜居乡里者,又复时受欺凌。乃□□各地同胞,更遭英日人之惨杀。埃及、犹太之亡国民,尚得安居篱下,不谓主权尚存之中华民国,反生不能安,死不得所!同胞乎,我最亲爱之五大族同胞乎,其忍袖手旁观,其能坐以待毙耶?否则宜速起共谋所以自救之道。今谨以指血书,以告我最亲爱之同胞;潜夫自今以后,“誓死救国”,外侮未去,决不偷生。愿同胞共起图之,无任盼焉。四川人陈潜夫泣告。

陈潜夫带血的泣诉更加促进了北京市和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运动,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“五卅运动”中震动人心的一页。(连载一)

2024年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90年,其前身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,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爱国将领杨虎城发起创建的。

杨虎城,号虎城,亦号虎臣,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人,著名爱国将领,其一生充满了爱国壮举,从蒲城起义开始,他反抗清朝暴政,参与讨袁护法运动,随后参与北伐,回到陕西主政,以兵谏逼蒋介石抗日,为国家民族立下赫赫功勋。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,被国民党特务杀害。

1930年10月,杨虎城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省民政厅长,在此后主政陕西长达8年的时间里,他大力发展陕西医疗卫生事业,支持创办省立医院,设立西安助产学校;采取一系列举措振兴教育,资助建立了孙镇高级小学、甘北村初级模范小学、蒲城亮山中学、阎良镇小学等。大力兴办水利事业,兴修了包括以泾惠渠为代表的一批农田水利设施;大力整顿交通,推动了陇海铁路的延展及咸(阳)铜(川)铁路的修建等。这些功绩,至今还在惠泽着三秦儿女。

在20世纪30年代,陕西没有一所高等学校。加之,1928至1932年,陕西又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连年大旱、蝗灾等天灾人祸,赤地千里,饿殍载道。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在国难当头、民族危亡之际,“建设西北”“开发西北”的呼声日益高涨,国民政府提出“兴学兴农”。

为了培养高级农业人才,杨虎城认为应先办农业方面的高等学府。在他积极倡议和争取下,在陕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、张继和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15人支持下,国民政府批准在西北建立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。1932年秋,国民政府批准了于右任等人提出的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,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,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一同担任筹备委员,于右任、张继、戴季陶等3人为常务委员,并将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部分校产划归西北农林专科学校。

1933年1月,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开始选择校址。杨虎城亲力亲为,与于右任等人一道前往咸阳、兴平、武功等地踏勘校址,划定校园范围,运用政府力量,顺利完成校园征地,并与筹建主任王子元商定筹建事宜,为学校建设起到决定性作用。校址初选咸阳高堡子一带,后经戴季陶、焦易堂及芬茨尔等农林专家再次复勘,认为选址不妥,遂将选址转向周至、眉县、武功一带。1933年6月初,校筹备委员会决定在周至县楼观台、马召一带踏勘校址。杨虎城于同年6月10日令周至县长王文伯(陕西蒲城人),让其给予便利,并要求县府派军警人员随从保护,不得有误。1933年6月14日,校筹委会常务委员于右任,与新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,陕西建设厅厅长雷宝华的新婚夫人陆望之,及校筹委会教授专家、林场主任、德国林业专家芬茨尔等人,在周至县楼观台、眉县汤峪、武功县贞元等地踏勘校址。踏勘结束后,经于右任、邵力子、杨虎城、张继等多人商讨,再经校筹委会研究决定,最终将武功县西的张家岗(今杨凌示范区)作为校址。1933年7月,校筹委会审核同意了址报告,于右任、张继、戴季陶等3位常委遂聘王玉堂为学校筹备主任,负责购买土地及监督工程施工,并着手建设农、林、园艺各场。

1934年3月30日,于右任被任命为西北农专校长;1934年4月20日,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武功县西张家岗正式奠基成立,从而结束了西北没有正式高等学府的历史。

杨虎城将军还积极参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《西北农林》的创刊,1932年秋,为校刊题写了“立国之基”四个大字,对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寄予厚望,也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。

1950年1月15日,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蒙难烈士的大会在重庆中华路青年宫隆重举行,刘伯承、邓小平等西南区党政军首长亲临致祭;同年1月30日,安葬仪式在陕西西安市郊区的长安县(今长安区)举行,彭德怀、习仲勋等西北区党政军首长也亲自迎灵;陕西省各界人士对杨虎城将军的牺牲表达了深深哀悼,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也表达了深切敬意,敬献挽联一副,联曰:“以苦心拥护国家,以大义调和党派,正气塞乾坤,杨公不死;为徇私残杀志士,为媚外出卖主权,舆论等斧钺,蒋贼焉生。”对联表达了师生们的哀思。

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是西北地区最早的高等农林教育学府。自诞生之日起,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、荣辱与共,肩负着建设西北、兴学兴农、培育英才的历史重任。1999年9月,更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,现已发展为全国重点大学,是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,是公认的一流农林院校。

杨虎城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

□ 张大雁



· 珍赏 ·

清铜鎏金嵌蓝饕餮狮钮方鼎香炉

□ 吴昆

铜鎏金器物是清代宫廷器常见的一种制作形式,大部分藏品都是雍容华贵的,清铜鎏金嵌蓝饕餮狮钮方鼎香炉便是这样一件藏品,令人赞叹。

铜鎏金嵌蓝工艺是一项精湛的艺术技法。铜鎏金工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,从古老的时代起,匠人们就掌握了在铜器表面鎏金的技艺。通过复杂的工序,使金与铜紧密结合,不仅能增添器物的华丽感,还能起到保护铜器的作用。而嵌蓝工艺更是锦上添花,蓝色的宝石或颜料嵌入鎏金的铜器表面,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。蓝色的深邃与金色的璀璨相得益彰,展现出独特的审美韵味。这种工艺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心,每一处镶嵌都要恰到好处,稍有差池便会影响整体效果。

饕餮,作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秘怪兽,在器物装饰中有着深刻的寓意。饕餮性贪食,在鼎上以饕餮为饰,一方面有着警示之意,告诫人们不要贪婪无度;另一方面,饕餮形象威严,具有辟邪、守护的象征意义。其夸张的面部特征和神秘的气息,也为香炉增添了庄重神秘之感。从美学角度看,饕餮纹独特的线条和造型,极具艺术张力,经过历代演变,成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

中的经典元素。

狮子在文化中寓意丰富。狮子并非中国本土动物,但随着文化交流传入后便深受喜爱。狮子被视为祥瑞之兽,具有辟邪镇宅的作用。在佛教文化中,狮子是庄严、智慧的象征,常出现在寺庙等宗教场所。在这件香炉上,狮钮的设计独具匠心。狮子蹲踞于鼎盖之上,威风凛凛,仿佛在守护着香炉中的袅袅香烟。其雕刻工艺精湛,毛发、神态栩栩如生,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。

香炉的演变历史源远流长。从古老的青铜时代开始,香炉就已经出现。最初,香炉主要用于祭祀活动,是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香炉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,成为文人雅士书房中的清供之物。在唐宋时期,香炉的制作工艺达到了高峰,造型多样,材质丰富。到了明清时期,香炉的设计更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的结合。

这件清铜鎏金嵌蓝饕餮狮钮方鼎香炉高约28厘米,是明清时期香炉工艺的典型代表,融合了多种工艺和文化元素,不仅是实用的焚香器具,更是精美的艺术品。它见证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发展,是古人智慧与艺术创造力的结晶。



老成都百年酱园“太和号”记趣

· 丝路文史 ·

□ 王淼

路未通;勤破君王天下事,五湖逐浪忆陶公。

分明是在劝说自己弃任从商。只是这道人何以刚一见面就晓得自己曾瞻天颜,而眼下又宦游他乡甚不得意?

这张铁口原本也是读书人,只是后来看到清廷腐败,仕途坎坷,才混迹“巾门”,相命营生。由于他久跑江湖,一见胡某是读书人“打头”,操着江南口音,便知是进士出身的宦游之人,而两榜进士都曾参加过殿试,故有“浴日”之说,又见胡某神情忧郁,卜向前程,便断定他久未实授;于是便动了“惺惺惜惺惺”之情,劝胡某另找出路。

胡某果然听了张道人的金石之言,定弃任从商,效法卓相,与两位同乡凑合白银千两,在棉花街开了酱园。他虽不懂生意,却善于用人,待人又厚道,故能内外协调,上下齐心。开业之后,年年都有盈余。到了咸丰年间,资金竟累积到了一万两银子之多。两位同乡因动了思乡之情,便下股退本,回原籍去了。合伙经营

时,酱园的招牌叫“元利贞”;现在由胡氏一家经营,便改为“太和号”,并从棉花街迁到正府街继续营业。

原来这“元利贞”与“太和”,都出自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说:“乾,元亨利贞。”疏云:“元,大也;……利,宜也,贞,正而固也。”又说:“保合大(太)和,乃利贞。”可见,“元利贞”与“太和”是同一回事,用到招牌上,大抵含喻“和气生财”之意。而胡氏一家几辈都能心领神会,以“和”相始终,保一百二十年家业不衰,也确实难得。

胡某自两位同乡回江西后,遂将妻室及次子胡继承接到成都以为襄助。长子胡石庵留在原籍。当时,胡某将家产划定,江西祖业归长子胡石庵所有,成都太和号归二房胡继承所有。不料,胡继承因病早衰,遗孀无后,老父又年垂风烛,胡石庵便遵父命,携家入蜀,全力协助二房经营。这胡石庵也果然得行,不到十年,太和号便夺魁同行。

太和号夺魁酱园行

胡石庵前后经营近五十年,家道日蒸,其首要“诀

窍”便是招牌所起的“和”。他一接管“太和号”便约法三章:一、生意主权永远属于二房,他只负责经营,按时向二房报账;二、盈余款额,由二房处理,绝不越俎代庖;三、他只得挣薪水,每年白银五十两,决不多用分文。主权仍然属于二房。胡家数辈,从未因争夺家产而发生乱子。二房见胡石庵辛勤而公正,过意不去,就买了三百亩水田酬谢他,以资晚年。

胡石庵乃一介书生,原本也不懂生意。但是,经营不到一年,他不仅学会了当老板,而且还精通了蒸、熬、拌、晒、包、捆、片、切等技术,变成了业务行家。他经常穿起围腰站柜台,苦活累活带头做。他为人节俭。一件布布衫有事出门才穿,回来就脱下,脚下也只穿家造布鞋。一日三餐皆与职工同桌而食,从不单开。每天夜里,他总要等全家睡了才就枕,数十年如一日,这一条,以后也成为太和号当家人的规矩。

(连载二)